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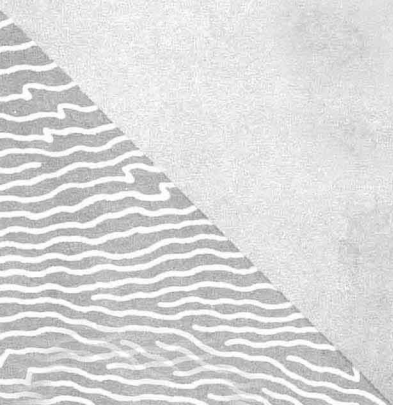
那盞梨子

那盞櫻桃



那盏梨子 那盏樱桃

寻根小说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校对:马朝阳

责任印制:蒋福彬

当代小说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那盏梨子 那盏樱桃

寻根小说

刘锡庆 主编

刘 稚 选评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保定西城电脑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科技印刷厂文斋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3 字数:264 千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 000

ISBN 7-303-01696-1/I·112

定价:6.50 元

总 序

刘锡庆

“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成为过去。

它是在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文革”废墟上艰难发轫的。“三中全会”开辟了前进道路。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解放。一篇《伤痕》，以它心灵的哀哭，血泪的控诉，拉开了讨伐给中国革命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左”倾思潮的战斗帷幕。《李顺大造屋》，显然延伸了历史“反思”的时间跨度，并由感情的控诉向理性的批判深化。就在这同时，《乔厂长上任记》登上了“改革文学”的舞台并造成了文学同步乃至超前于现实的可喜景观：许多工厂贴出大字标语：“欢迎乔厂长到我厂上任”！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力量。《棋王》、《爸爸爸》反映了一批年轻作家追“寻”民族文化久远悠长之“根”的积极倾向：前者强调“优质”的发掘；后者侧重“劣根”的批判，一水分流，相反相成。“寻根”实在乃是“反思”、“改革”深度思维的一个自然结果，它强化了文学的“文化意识”，使小说的审美品格上升到了“文化层面”这一五彩斑斓的艺术天地。与此相“对峙”，另一批年轻作家则接续了早期“意识流”、“荒诞”等探索小说的流脉并进行了视野更为开阔的实验。《你别无选择》、《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在艺术创作上的意义也许是更为深远的。“改革开放”的“风雷”同样鼓荡着“九州”的艺术弄潮儿。鲁迅说：“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是一条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另一条路。是“一条路”，

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至于成败、得失，那需要审慎鉴别——但既是“探索”，就要允许失败。不允许失败，甚至不容忍稚嫩、失误，那至少是不够大度的。事实上，人民群众不仅长于明辨政治上的“是非”，而且对艺术上的“是非”（优劣）也明察秋毫。“读不懂”、“沙龙气”、“离我们现实太远”、“玩文学”等等，这里面就包含着读者对这类所谓“新潮”作品“横移”照搬、食洋未“化”的中肯批评。实践表明：“新潮”的低落并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而恰恰是艺术发展“内在规律”所表现出的一种自然扬弃。于是，“新写实”应运而生。这类小说在题材撷取、情节叙述、人物描绘、语言运用上都十分尊重群体审美习惯，毫不犹豫地向着传统“回归”；但骨子里却依然存活着一颗探寻创新、不甘守旧的活魂。它熟悉而陌生，传统而现代。《风景》、《单位》（还有其姊妹篇《一地鸡毛》）等，都使人耳目一新。“新写实”方兴未艾，过早地给它做“结论”：或是“捧之上天”，或是“按之入地”，我认为都是“帮倒忙”，没有好处。再看一看，让它发展嘛！稍安勿躁。它现在是有一些毛病、偏颇甚至有一些较严重的、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但那可以帮助，可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一路“铲除”、“横扫”、“爆破”下去，那结果只能是一片荒芜。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本意是向爱好文学的年轻读者们提供一个在写作上、艺术表现技巧上可资参阅、借鉴的写作用本。

我们首先想到了小说。在一切叙事文学中艺术形态最完备、写作技巧最精妙、表现风格最多姿的莫过于小说。而新时期的小说洋洋大观，流彩溢光，能够较好地负载起上述编选意图。“伤痕”、“反思”、“改革”小说，争议不大；“寻根”、“探索”、“新写实”，见解纷纭，比较复杂。而特别是这部分比较“复杂”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参照、借鉴方面又是很难抹煞、回避的。视而不见“躲”过去，尽量回避“少”选入，并不是办法。最好的选择就是全面的反思，冷静的回顾，辨清良莠，别出高下，把“孩子”和“脏水”分开：当留则留，该弃则弃。为此，我们这套丛书采取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

态度,全面展示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小说创作的“多样化”风貌,六册书一齐推出,使公正而严明的读者能在阅读中回顾,在回顾中思索,在思索中借鉴,在借鉴中创新,为发展、建设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真实画出国人魂灵的社会主义新文学而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回顾并不是“展览”。选编乃有“选”有“评”。我们的编辑目的既在于写作借鉴,其选文原则即不能不有所偏重。其具体想法是:第一,政治上是非应分明。鼓吹“自由化”的,宣扬有害倾向的,绝不入选。第二,学术上、艺术上的是非、优劣不急于评断。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好。第三,各阶段、各思潮流派中当时具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作品宜适当顾及。因为这些较“知名”的篇什,体现了当时读者群经过比较、鉴别之后的一种筛选和肯定。但很多“轰动”一时的作品的确并不见佳;一些“默默无闻”的篇章也的确不乏奇光异彩——现今的“选家”理当放出自家眼光审度、取舍。第四,艺术表现上有新意的优先入选。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发现、创新,无独特“艺术个性”即永远不能在“艺术王国”里驻足、立户。当然,“新”亦不一:题材开拓新,构思立意新,叙述角度新,表现手法新,技巧运用新,语言格调新……不求全备,有“新”则佳。

这项工作本来是应视为一种“慢功细活”从容做来的,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有价值、有份量的“精神食粮”是多么难求!特别是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者朋友们,他们要想找到一套比较完备的“新时期小说”选本也不大容易了。有鉴于此,参加编选这套丛书的一些选评者是本着“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工作的。“快”就可能伴着“粗”。但他们也是青年,由青年人来做青年人做这件事情,它所带来的一些优长、特色也许能够稍弥补这些不足吧?

1992年3月初

选评者序：寻根：民族的原生态和文学的现代感

刘 稚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生了整个新时期文学，那么，1985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则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尖锐冲突时诞生的。一方面，文学发展本身的刺激，产生了“寻根”文学。当时，反思文学由对“文革”的政治批判到对十七年来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的反省，进而把矛头指向造成“文革”这场大劫难的群众基础，它背后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由社会政治反思走向了文化反思；与此同时，改革文学在揭示改革的深层阻力时触及到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引导人们深入思考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心理机制，二者殊途同归，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进一步深化的结果，都引起了文学对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回顾，所以，“寻根”文学作为一种自然接续，成为继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之后又一重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另一方面，时代的重大使命也催生了“寻根”的文学思潮。在世界文化既相互融合又彼此独立的趋势下，各民族都在寻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怎样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怎样在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比照下保持我们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这是首先必须确立的。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掀起的“文化热”就是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机制中僵滞与再生的因素，探讨如何在文

化的自我更新中使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当代中国文学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使中国产生了一批“现代派”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充满了西方现代经典作品的痕迹,它所表现的种种主题诸如“荒诞感”、“孤独感”等等,与中国还在求温饱的广大老百姓的生存境况实不协调。所以,文学在短暂地追慕西方现代派文化的余晖后,走向了回归自己民族文化的路途。面对民族和文学双重确立自我的难题,一批青年作家提出了“寻根”的文学主张,基本倾向是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土壤,发扬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素,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理想价值,努力创造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寻根”是源于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寻找自我的生命冲动,想重新提示中华民族数千年不衰的光荣历史依据,也是骄矜于传统文化审美意趣和几千年丰硕的文化成果。“文化”是“寻根派”抓住的一个“绝大的命题”,以此为突破口,反对过去文学对生活的表面反映,获得一种历史的积累。阿城说:“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①认为过去的文学常常只包含“社会学的内容”;韩少功也指出:“作者们写过住房问题,特权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引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②“寻根”文学基本上从当时文学题材和主题的热点上退了出来,在生僻的地域和生僻的人群(这离现代都市文明)上用笔。作家们各自占据古老大陆的一隅,努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揭示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行为观念、生存方式。如韩少功对湘西楚文化,李杭育对葛川江流域的吴越文化,贾平凹对商洛山区的秦汉文化,张承志对中亚草原文化,阿城对老庄文化,王安忆对儒教传统

①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②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文化的发掘等等。由于这些地域远离现代文明,处于封闭和凝滞的状态,较好地保存了原初的文化形态,就象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民族久远的历史和古老的生活方式,“寻根”文学由此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厚度和文化积淀,刻意展现了我们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形态,这是过去的文学几乎忽略了的。但是,由于“文化”这个词本身涵括极大,“寻根派”在为我所用时,把“文化”狭窄化了,他们偏向于民间文化、地域文化,这样就显得眼光过于专注和单一,无形中把自己的创造力束缚住了。

二

“寻根派”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高远的现实目标和文学理想。但在世界格局中坚持民族独特性的现实目标上,“寻根”文学由于过于关注传统而有忘怀于当代之嫌,这使它无法解决“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问题;而建立在一种“深厚的文化开掘”基础上的文学理想确是获得了某种实现。在“寻根”的旗帜下,是一批璀璨斐然的文学佳制,《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红高粱》等等,这些小说各自构筑了一个感觉意象极其饱满的艺术世界,在深阔的民族生活背景下展示了人的生动情状,在语言、结构、风格上都显示出对传统审美意趣的出色传达。它重视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继承,强调在感觉中体味、在体味中重现,讲究艺术的直觉、想象和还原。“寻根”文学因此恢复了文学的一些传统审美品质。另一方面,“寻根”派“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①的意向,是在东西文化的互渗与对比下产生的。“寻根”文学在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现代存在哲学与历史哲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叠合的地带,产生了自己的审美新质,这就是整体地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方法,深切关注人的

^① 韩少功《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文学日报》1986年第6期。

存在状态,并具有乐观的历史主义精神。

“寻根”文学首先带给新时期文学一种新的审美品格是“自我”意识的谦抑和叙事态度的变异。从古代士大夫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的不息兴味看出,乡村文化一直具有长存的魅力。作为人类早期生存方式的产物,并占据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时期,它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与土地、自然的亲近,它那较合乎自然人性而显得优美怡人的生存方式,使现代工业文明下的人类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不少哲人发出“人是自然的儿子”,而倡导“回到乡村中去”,这种回归意绪,几乎产生了整个世界的怀乡主题,“乡愁”不仅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怀念,而且是对人类远祖的血缘回溯,是人类寻求精神家园的企望。“寻根派”把笔越出现代都市社会,探入边远的乡村、山林,未始不是源于同样的意向,意在人类早期文明的痕迹中,找到现代人的生存依据、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来源,由这种确证获得精神宁静和心灵平衡。不过,“寻根派”的回归更重在寻求自我对民族、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智慧的代表,常常游离于群体之外以人类的另一个自我来反观人类自身,是人对自己的诘问和对话,这种游离状态使知识分子有了一种优越人格但同时就使他饱尝灵肉分离和人格分裂的痛苦。“寻根”是知识者想望复归整一,在对原初文化的迷茫感悟中,消弥那个理性的自我,实现一次角色置换。在对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清醒的知性判断与迷乱的情感取向中,“寻根”文学传达了这样一种复杂的意绪: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它呈示为一条很清晰的血缘回溯线索。王安忆去了美国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生长的这片大陆,反而对自己的血缘、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籍、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常清楚的意识,“越发觉出了我是我。”^①韩少功在小说《归去来》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血缘回归

① 王安忆《归去来兮》——《文艺研究》1985年第一期

意向。小说在荒诞中达到了极高的真实，它描写了一个似真似幻、亦真亦假的情境中，一切都既陌生又熟悉，显示出传统文化在时间的变量中恒定的“常”态来。“我”和山民从误认到确认，自我变得不可确定而消溶于群体之中，我再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我”只是连接世世代代“无数偶然的一个蓝色受精卵子”，是人类生物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这恐怕是最彻底的“寻根”了。在对历史、文化、血缘的沉思中，在对民族生存方式的认知过程中，“寻根”的结果是一种“认同”心理的产生。“寻根”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致力于批判国民性的文学精神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对生活实在的认同。以前知识分子的强悍理性批判意识与居高临下的心态渐次淡化，主体隐没代之以群体的凸现，“小我”和民族“大我”共忏悔。这便有了张承志式的忏悔与李锐式的认同。张承志早在《绿夜》与《黑骏马》中就表现了对现代都市的叛逆，和对血缘与精神母体的回归。此后的《北方的河》、《GRAFFITI——胡涂乱抹》、《九座宫殿》、《黄泥小屋》更是体现着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在长期的汉文化浸染中重新寻找本民族文化的优质与特长的持久冲动。李锐表述了一种观点，他认为：“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素材……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要在“对自己作为具体的人的存在中肯定自己”^①。这可能是“寻根”派作家的共识。在民族生活“常与变”（沈从文语）的辩证关系中，“寻根”作品更多表现的是“常态”人生，目的是要从“四千年的历史”中发掘“身受了这么多磨难而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王安忆）。《小鲍庄》展示了正统的儒教观念内化在人们的生活行为中，如何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持与救助的关系，所以它对“仁义”的宣扬，不是对作为封建

① 李锐《厚土自语》——《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礼”教的讴歌，而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意志与行为方式的赞美。李锐在对人的真实处境的体察中，感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的悲怆与镇定。即使是最具批判意识的韩少功，也在《爸爸爸》中表达了对生活本质的默认和对历史前进的信心。认同心理决定了对民族更是对个体局限性的确认，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谦抑，在对民族生存状况的严峻拷问中，“寻根”文学大多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叙事态度，是主体最终获得的一种对生活、历史、民族、自我的静观默察的“冷眼”与达观。比如《爸爸爸》的调侃与幽默，《小鲍庄》的沉着与不动声色，《厚土》苍凉沉郁的呈示笔调……这种零度感情态度是主体对历史生活本身的“哑然”与“不言”。由于作者的审美感觉是多层次的，既有沉痛的拷问，又有严酷的批判，还有深情的关注与忘我的体味、共鸣与交感，它复杂地纠结在作品的内在情蕴中，而不表述为某种明晰的理性说明，形成了作品内在充满动力的情绪场与审美场，有时候引起了人们对它“主旨含混”的误解。其实它的目的正是要让文学成为读者与作者共同完成的一个审美认知过程。消除价值判断，实现对生活流程与生命过程的体认，这应该是“寻根”文学对后来的文学特别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提示吧。“寻根”文学作品大多获得了对外在世界整合齐一的观照，故而能从世间人事的局部达到对整个人类存在的体悟，作品多表现出内在的静穆：时代背景的模糊，人们生存的常态行为等，抹杀了时间的意义，消弥了个体独特性，在一种无穷重复与循环的存在状态中，宣示了一种永恒性的内涵。体现了一种重直觉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寻根”文学的另外一个成果是洗去了关于人的理念遮蔽，而还原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在对人的理解上，达到了在老庄“道通为一”的“万物齐一观”，即人与人之间并无本质的高低、贵贱之分和西方现代存在哲学强调“过程”的意义之间的同一：在人的现实局限性当中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人的复杂性面前，承认人的自

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本能与文化制约的复杂纠缠。“寻根”文学既突破了改革文学的“英雄”模式又不同于反思文学的批判意味，更区别于“现代派”小说所表现的人在“孤独感”中的躁动失衡，它所弥撒的平和朴实的人生态度，为当代文学写“人”开拓了一片审美新域。

“寻根”文学流溢着一种真正的平民理想：或是表现芸芸众生的人生百态，如《爸爸爸》、《小鲍庄》、《厚土》等，基本上是群像描绘，把对人的描写溶入到阔大的文化背景中；或是凸现出传统的理想人格，并在现代审美意义上放大、渲染之。那么，无论是王一生、还是余占鳌，都只是平凡人间的一分子，当笼罩着巨人和“权威”的光圈消失后，野史轶闻里的村野之民渐渐还原为历史的主角。阿城“平了头每日荷锄”所悟：“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上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棋王》）的“真实本相”，诚哉。

“寻根”小说的文化意味体现在人物塑造上，一是揭示文化对人的制约，显示出人的行为观念方式背后那个巨大的传统，写人在这种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无意识地裹挟着演绎自己的欢欣、痛苦、忧虑和梦幻；二是在现代意义上重新阐释老庄关于“不为物役”，在一种充分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中获得对现实的社会人生的超越，并与永恒、无限的自然宇宙合为一体的审美人格。比如《棋王》里的王一生，不谙世事，不近流俗，操守如一，骨气奇高，在“呆”与“拙”的外表下实则是一种“大智”与“大巧”；他跟“天下人”学棋，虚怀若谷，聚情养性，在浑然忘我的虚静中了悟自然机枢与万物同一，无为而无不为，实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对这种“自然”、“天真”的传统审美人格的崇尚，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中物欲横流、人多羁绊的现实的批判。三是在文明的压抑下张扬所谓“自然人性”，宣示一种由“人的生命力和潜能的自然流露所造成的身

心和谐”^①的原始生命形态，以此来观照现代人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二元分离的痛苦，以反对文明对人的桎梏。不少“寻根”作品都追慕一种生命力和自我个性自由勃放的境界，塑造了一类草莽英雄、豪强之徒。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老棒子酒馆》中的陈三脚，他们既是土匪又是英雄，杀人如麻又柔情似水，追求热烈的性爱自由，怜贫惜子不失侠义之风。

为了与所表现的原初文化形态、“常态”的民族生存方式相切合，“寻根”派作家不约而同地寻找相应的叙述方法，导致了语言和文体的变革。李杭育曾经表述了他对语言的这种追求，当他深入到吴越文化中，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生力时，他觉得必须找到与那儿人们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表达方式，这样才能切入到那儿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中，与之同一，而不显出知识者、现代人作为局外人的生涩状态。他说：“我一直在寻找某种语言，以便用来表述我所意识到的吴越文化及其当代内容。我要找的语言，绝不仅仅是方言俚语之类，也不能作一般语言风格来理解。简单说，它是一种口气，讲故事的口气；……语言最终就包囊了小说的全部形式和技巧。一个作家的最终出息，就在于找到最合他脾胃，同时也最适宜表现他的具有特定文化背景之韵味的题材的那种语言”^②。作家的这种语言的自觉意识，标志着文学的成熟。许多作家都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习惯。王安忆一反早期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在《小鲍庄》中变而为客观冷静的呈示手法，《雨，沙沙沙》的诗意语言消失殆尽；郑万隆也从《当代青年三部曲》富于激情的描述语言改变为《异乡异闻》这样具有粗犷、凌厉的山林气质的叙事风格；其它如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等人都各各找到了与他们要表现的世事人生相吻合的叙述方式。这不单纯是因为题材的转移，而与作者观察

① 方克强《寻根者：原始倾向与半原始主义》——《上海文学》1989年第3期

② 李杭育《从文化背景上找语言》——《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

生活、把握生活的艺术感知方式的变化有关。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语言、文体的自觉探索在他们这儿蔚为大观。他们力图打破现代汉语日渐规范化后失去表现活力的形态,或寻找一种生动活泼俚俗的民间口语;或运用古典雅致的古汉语形态,造成语词的陌生化效果。《小鲍庄》使用的就是淮中地区的方言语态,这种叙述语言漂尽了作者自己的话语方式,完全贴近于小鲍庄人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把农民生的耐力与韧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老棒子酒馆》的叙事风格,则逼真地再现了山林的寒冷诡异、“法”外之民的刁钻、凶蛮。《爸爸爸》在一种不确定性叙述中,传达出湘西蛮夷之地山民与“怪力乱神”、巫卜盛行之风相伴而来的愚昧而怪异的生存状态。《厚土》系列在精湛短小的篇制中极力营造饱满的意象群落,以呈现的手法,将“土地——人”的主题寓以深厚沉郁的文化况味。静态而有节制的叙述,精雕细镂的语言,体现着一种“现时即永恒”的哲学思想,表明作者对人的生存的深入体验与思索。“寻根”作家中有一部分人刻意经营一种“新笔记体”,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等人和早已开始了这种文体的自觉实践的前辈作家汪曾祺,在语言、结构和艺术精神上师承古代笔记小说,品评人物,指事类情,讥弹时世。推崇传统的“主观情致说”,讲究创作主体情致心态的自然流露,在指事论人中见出作者的情态与胸襟,在超然物外的叙述中,见出作者饱经沧桑、世事洞明又恬然淡泊的心境,因为不执着于事理、不落筌于是非判断,作品显得空灵飘逸,神形兼备,气韵生动。就在这种语言和文体的自觉追求中,“寻根”作家们渐次获得了个体风格的独特和成熟。

三

“寻根”的文学思潮是在振臂一呼的情形下,一些有相同相似见解的作家迅速汇聚拢来而形成的。这之中,口号的提出,多因对文学创作现状的感性的经验的判断引发,而较少理论上的深入琢

磨。新时期文学正从“文革”造成的文化废墟中站立起来，逐步恢复着自身的品格，并开始走向它的繁荣期，这些敏锐的作家有感于当时文学存在表层次地反映生活这一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提出要让文学建立在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上，要从“文化”这个阔大的背景上来理解文学应该反映的内容。“寻根”的意图是极好的，它使文学面对一个更广阔的对象世界和更深厚的根基。它对民族独特性的强调，可以说更坚定了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上，二者是相反相成的，缺少民族性的确不可能具有世界价值。其实，回顾过去是一切艺术的通性。过去永远活在人的记忆中，现在是无数个过去织就的，所以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基本的经验是永远成立的，占有了过去意味着在很大意义上统领着今天。文学总是回顾过去，还在于文学描绘的总是人类已有的经验，它的意义在于它包容了人类对自己无法重现的历史和过往的永恒追念，对时间矢量无可挽留的慨叹。可以说“寻根”回溯过去的主张，是对文学本质特性的回归。“寻根”派要建立一种“纯文学”，但其中又有着功利性目的：寻根是为了走向世界。这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爆炸性影响给予中国当代文学的刺激有关。这样，文学想确立自我的意识中就难免有希望获得某种承认的急切心理，它实际上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寻根”之初，由于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声势，一个热点，它就难以避免这之中的浮躁，而缺乏更深沉的气质，造成了理论上的某些偏颇。由于：“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切入，它直接面临着当代的两个理论难点：即东西文化的优劣与短长问题；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兼容与扬弃问题。对于前者，“寻根”派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开始了大转变，从崇尚转向排斥，而倡扬甚至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后者，为了把握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它偏向于挖掘那种凝滞的常态的传统人生，而对历史的进程与演化看得比较淡漠，这直接导致它与当代的疏离。“寻根”文学在专注于展示与呈现初民形态与原始人生时，它引导人们不单是在纯然审美意趣上的

趋同,而且是价值上的趋同,即不单是审美的回归而且是历史的回归。而历史是永远前行的,所以“恋旧”总是背朝时间向度,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由于中国正面临走向现代化的迫切关头,现实并没有给予人们专注于审美的余裕;同时,在时代的主题面前,任何一种与此不符的意绪都可能引起人们对民族未来前途的敏感联想,这便是“寻根”派对传统与现代把握失重而引起众多非文学批评的原因。本来,文学不应承担过于沉重的现实主题,文学永远不是要给予人们既成的答案和指导。“寻根”派由于切入到时代的热点中而获得了空前的生存活力,但又因为这种切入而丧失了自己的审美独立性。

“寻根”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寻根的意向与寻根的结果之间没有达到一种同一,后者反而是对前者的意义消解。“寻根”的初衷是为了“重建”,既是重建一种具有传统文化精神优秀内质的纯文学,又是要重建一种民族精神;但“寻根”所寻到的原初生活形态并不怎么具备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当然它其中隐含的作者或赞赏或迷恋或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实际也指况了对未来的建设性意见。

对于“寻根”者而言,一种理论热情、一次文学实践由兴盛而衰微,其中恐怕不无悲壮的感觉。他们是承担了一个过于巨大的命题了。“笔下塑造不出新人”的苦恼何止是扎西达娃个人的苦恼。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新的确立是如此艰难,而旧的死灭又是如此不易,何况传统与现代的交战远远不就是落后与先进、负面与正面的争持。“寻根”者们深知历史的真实情状而坚持着对历史前进的信心。韩少功在《爸爸爸》中让那支古歌又一次明亮地响起。但人们往何处去,仍然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它使人充满希望又不无惆怅。不论怎样,“寻根”者对于民族未来的积极参与意识和崇高使命感终究是可嘉可叹的。